

## 重塑道統——《四書大全》中的新安學脈

陳逢源\*

### 摘要

明成祖（1360-1424）於永樂 12 年（1414）十一月下詔，命翰林學士胡廣（1369-1418）等編纂《四書大全》，內容承襲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多，至於倪士毅《四書輯釋》則是匯整陳櫟《四書發明》與胡炳文《四書通》而成，所代表正是新安一系四書詮釋成果。考《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於程、朱之外，屬於新安人氏有王炎、胡次焱、程若庸、吳浩、陳櫟、汪炎昶、朱仲（疑為朱申）、胡炳文、張存中、倪士毅等人。剔除歸於饒魯一系的程若庸、吳浩之外，其餘共計八人，徵引 1740 條，佔 29.52%，為《四書大全》最主要的徵引材料。朱熹之後，學術脈絡旁出，各有發揮，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發展，既具精彩，也更增分歧，新安學人於宋元之際，從各立宗旨，各自引伸的進路，轉為持守深化，以朱熹學術作為凝聚鄉里情感的文化符碼，成為明儒建構經典詮釋的基礎。分析其中，標舉朱熹學術為宗，具有化解分歧的意義；發凡起例，可以了解朱熹注解原則；回歸於經注之間，得見朱熹用字之不苟；進而將「道統」與四書義理縝密結合，深化程、朱於道統續傳之地位，乃至於對饒魯雙峰學術的思考，以及定本的追尋等，充分展現新安學人的學術成就，於此細節，揭之而出，得見宋元之際新安學人貢獻，也得以了解明儒四書學發展的背景脈絡。

關鍵詞：朱熹、倪士毅、四書、新安學、四書大全

---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 Tong)”: The Xin’an School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Da Quan)*

Chen Feng-Yua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Yongle Emperor (Chengzu of the Ming Dynasty, 1360-1424) commanded Hu Guang, a Hanlin academician, to compile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Da Quan)*. Hu adopted Ni Shi Yi’s approach in *Collected Exegesis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Ji Shi)*, the confluence of Chen Li’s *Discovery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Fa Ming)* and Hu Bing Wen’s *General Survey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Tong)*. It reveals that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is the achievement of Xin’a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s. In fact, besides Cheng brothers (Cheng Yi and Cheng Hao) and Zhu Xi, the Xin’an scholars whose works were cited in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are as follows: Wang Yan, Hu Ci Yan, Cheng Ruo Yong, Wu Hao, Chen Li, Wang Yan Chang, Zhu Shen, Hu Bing Wen, Zhang Cun Zhong, and Ni Shi Yi. Expelling Cheng Ruo Yong and Wu Hao, who belonged to Rao’lu School, there are eight Xin’an scholars. And there are 1740 citations from them, accounting for 29.52 percent of the materials in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It is worthy to know that many scholars formed academic clans of their own and illustrated Confucianism in different ways after Zhu Xi. Their works made Confucianism brilliant as well as diverse. After constructing their theory in the beginning, Xin’an scholars deepened their thoughts and used Zhu’s doctrine to cohere their neighbors between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n their work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Ming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classics. Taking Zhu’s notion as the core of their school

eliminated the divergence between Xin'an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Xin'an scholars followed Zhu's principle to produce instances and hence they not only understood Zhu's words clearly but also combined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 Tong) and the ordinance in the Four Books successfully. Moreover, they confirm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eng brothers and Zhu Xi's po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publish a firm version, they also investigated the arguments of Rao'lu and Shuang fong Schools. The above manifested Xin'an scholars' academic achievements, which assisted the subsequent researchers, as well as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Four Books in Ming Dynasty.

**Keywords:** Zhu Xi, Ni Shi Yi, Four Books, Xin'an school,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Da Quan)*



# 重塑道統——《四書大全》中的新安學脈\*

陳逢源

## 一、前言

明成祖（1360-1424）於永樂 12 年（1414）十一月甲寅下詔，命翰林學士胡廣（1369-1418）等編纂《四書大全》<sup>1</sup>，挾其官學威勢，成為朱熹之後四書學正典化最重要的推手<sup>2</sup>，影響甚至及於海外。<sup>3</sup>辻本雅史指出貝原益軒（1630-1714）是以明代科舉前提下出版的「四書學」書籍為途徑，來理解朱子學，甚至可以說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的日本儒者，包括林羅山（1583-1657）、中村惕齋（1629-1702）、安東省庵（1622-1701）、毛利貞齋等，基本上也是吸收科舉制度下朱子學的結果。<sup>4</sup>相同情形，也見於韓國儒學，朝鮮世宗 8 年（1426）從中國輸入《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並從 1428 年起分給各道刊行活字本，從此之後，朝鮮五百年歷史上，成為

---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本文乃執行科技部計畫「工夫·境界·定本——《四書大全》地域、學脈、宗族之綜合考察」所獲致之部分成果，編號為：MOST 103-2410-H-004-153-MY2，助理為李松駿、吳凱雯，在此一併致謝。

<sup>1</sup> 明·楊士奇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58，頁 1803。

<sup>2</sup> 蕭啟慶云：「道學在科舉中的獨尊及成為近世的官學是始於元代，而非宋代。不過，道學在元代僅為儒學各派中的官學，還算不上『正統』學術。因為科舉在當時並非入仕的主要管道，而儒學不過是諸『教』中的一種。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是在明朝。」又「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頒行《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成為科舉考試及學校教育的準繩，廢棄舊注疏不用，但這兩部官纂大全與元代科舉所用注疏乃是一脈相承。朱學獨尊的地位自此獲得鞏固。」氏著：〈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1（2010.3），頁 23、26。

<sup>3</sup> 閻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 4-5；張巖：《〈四書大全〉研究》（武漢：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論文，2009），頁 3。

<sup>4</sup> 〔日〕辻本雅史撰，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收入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31-135。

不變的教科書。<sup>5</sup>朱學成為東亞儒學核心，四書成為共同文化符碼，乃是儒學發展當中，真切而實際的情形。只是回歸於經學史，學人對於《四書大全》殊無好感，《四庫全書總目》云：「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為重，故五經率皆度閣」、「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sup>6</sup>，由五經而及四書，代表經學典範的轉移，然而所謂之「變」，卻是直指經學風氣的敗壞，延續此一說法，孫星衍（1753-1818）〈詁經精舍題名碑記〉云：「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sup>7</sup>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更直接以「極衰時代」概括明代經學，《四書大全》成為罪責的緣由。<sup>8</sup>由明至清，評價迥然有異，原因出於清初學者反省學風的結果，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比對劉剡《四書通義》所附倪士毅（1303-1348）《四書輯釋》，批評明儒搪塞君命，不足以成就一代盛典，云：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sup>9</sup>

所謂「經學之廢」，來自於不正確的態度所造成的影響，顧氏強調士人應有更強的道德自覺，具有鍼砭世風的苦心，只是歸責於臣，顯然是輕忽當時政治氣氛。首先，

<sup>5</sup> [韓] 崔錫起：〈朝鮮時代經書解釋與崔象龍之《論語》解釋〉，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9），頁 101。相對於此，鄭亨愚則依據《世宗實錄》認為是世宗元年（1418）庚子，成祖刊刻後 4 年《四書大全》便已傳入朝鮮，兩者說法有異，但傳入之後，影響日深，則無不同。參見氏著：〈《오경（五經）사서대선（四書大全）》의 수입 및 그 간판（刊板）광시（廣布）〉（五經四書大全的輸入與其刊板廣布），《東方學志》63（1989.9），頁 1-27。

<sup>6</sup> 清·紀昀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36，「《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提要，頁 742。

<sup>7</sup> 清·孫星衍：〈詁經精舍題名碑記〉，《孫淵如先生全集·平津館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45。

<sup>8</sup>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頁 289。

<sup>9</sup> 清·顧炎武：《原抄本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卷 20，「《四書五經大全》」，頁 925-926。

成祖奪位成功，本身並非庸儒之人，永樂一朝，氣氛肅殺，豈能容臣子偷儒，政權移轉之際，以「政」領「學」的思考，並非純然為了學術。<sup>10</sup>其次，顧氏比對的材料，乃是明代重刊本，重複纂輯的結果，就時間順序而言，其出在後，也未必可以作為證據。<sup>11</sup>如今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日本文化9年(1812)覆刊元至正2年壬午(1342)

<sup>10</sup> 明·楊士奇等撰：《明太宗實錄》，卷168，頁1872。從得位而及於政教，成祖於永樂15年(1417)九月丁卯孔子廟訖工親製碑文，云：「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遍賜經籍……，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彰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卷192，頁2030。強調太祖表彰儒學，以及自己繼承之意，結合政教以得道統，建構得位施教的論述，用意至為清楚明白。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33-59。按嚴明成祖〈御製性理大全書序〉云：「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頁12-13。書成奏進，成祖頗為滿意，與後人批判觀點明顯不同。按嚴清·談遷：《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16「成祖永樂十三年九月」下引「臨海陳燧常曰：『始欲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擇，未免抵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頁1122。速成難免疏失，但出於成祖意志，顯見用意在於政治的宣示作用。

<sup>11</sup> 元·倪士毅：《重訂四書輯釋》，收入王逢輯：《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明刊黑口本），「重訂姓氏」，頁1-6。倪氏之作，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倪氏懼其未密，遂有重訂工作，明初於是將倪士毅《輯釋》、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以及王元善《通考》合刊，後正統中則有王逢、劉刻取倪士毅、趙汭同訂的《重訂輯釋》、朱公遷《約說》、程復心《章圖》，以及王逢的《訂定通義》拼湊的版本，見劉刻輯：〈新刊重訂輯釋通義源流本末〉，收入王逢輯：《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頁1。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37列於存目云：「書中亦糅雜蒙混，紛亂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為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頁760。其中關乎先後順序問題，胡廣〈四書集註大全凡例〉云：《四書大全》以吳真子《四書集成》、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底本，刪削悖戾之處，增錄未收材料，至於訓釋文字，則取陳櫟（1252-1334）《四書發明》之說，用意在於綜整元儒四書詮釋。吳真子《四書集成》今存殘卷，倪士毅《四書輯釋》原稿未存，後儒纂集重刊後，已非其舊。顧炎武比對劉刻所刻《四書通義》中的《四書輯釋》，認為「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然而劉氏所刻乃明代書商訪求之重訂本，時間是在《四書大全》完成之後，觀察未必正確，《四庫全書總目》承其誤，批判「明永樂中，詔修《四書大全》，胡廣等又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概竊據，而《輯釋》、《通義》並隱矣。」其實王逢重訂本為《四書大全》之後的作品，元儒著作存世絕少，後世匯整重刊，揉雜蒙混，紛如亂絲，四庫館臣亦不免誤判，《四書大全》乃明初匯整工作，適足以一窺元儒治經情形，卻深受誤解，殊為可惜。以目前所存版本，倪士毅撰《四書輯釋》，有至正日新書堂初刻本，殘卷收於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日本有文化9年覆刊本，明初則有倪士毅《四書輯釋》、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王元善《通考》的合編本。至於明正統中王逢、劉刻重訂本，則是取得倪士毅《四書輯釋》的重訂本，在明初《輯釋》、《章圖》、《通考》合編的基礎上，參照金履祥、許謙、朱公遷、史伯璇等著作，重刊重訂而成，即是建陽詹氏本。事實上，王逢著書後於胡廣，《四書大全》依據明初倪士毅初刻本，兩者版本並不相同，觀察徵引名錄之差異，

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日新書堂刊本，比對《四書大全》內容，承襲雖多，但差異亦大，胡廣等人並非絕無用心，細節之間，得見建構朱熹、門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經說體系，確立朱熹昂然挺出的宗主地位。<sup>12</sup>顧氏批判明代士風，有其用意，但細節之間有失詳考，也是事實，原因乃是元明之間，四書纂修紛雜舛錯，梳理為難，不過指出《四書大全》與倪士毅《四書輯釋》關係密切，點出元明之際四書學發展極為重要的線索，提供本文思考的依據。按覈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引楊士奇（1365-1444）言「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為多，他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雜，不若此書，多醇少疵」、薛瑄（1389-1464）言「《四書集注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萬授一言「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明備，采擇精當，莫如道川倪氏之《輯釋》」<sup>13</sup>，倪士毅《四書輯釋》承陳櫟《四書發明》與胡炳文（1250-1333）《四書通》<sup>14</sup>，集其大成，《四書大全》承《四書輯釋》，乃是揀擇之後的結果，而三人同為新安人氏，可見倪士毅《四書輯釋》的重要地位，也可見元代四書學新安學人扮演的角色。晚近學者開始留意元明之際四書學的發展，蘇惠慧《元代新安理學研究》<sup>15</sup>、劉成群〈元代新安經學與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sup>16</sup>、〈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經學為敘述中心〉<sup>17</sup>、顧永新〈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sup>18</sup>等，已有初步觀察，然而回歸注疏傳承，則尚未進行，筆者比對《四書大全》徵引情形，梳理朱熹之後學術流衍情形，撰成〈「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

亦可得見。詳參顧永新：〈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2（2006.3），頁104-112。

<sup>12</sup> 參見陳逢源：〈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成大中文學報》49（2015.6），頁75-76。

<sup>13</sup> 清·朱彝尊：《經義考》第7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卷255，頁8-9。

<sup>14</sup> 「先師定字陳先生方編《四書發明》，時星源雲峰胡先生亦編《四書通》，……士毅不揆淺陋，亦嘗僭欲合二書為一，以自便觀讀。先師可之。」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凡例〉，《四書輯釋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日本文化9年覆刊元至正2年壬午夏五日新書堂刊本），頁1。

<sup>15</sup> 蘇惠慧：《元代新安理學研究》（合肥：安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6），頁3。

<sup>16</sup> 劉成群：〈元代新安經學與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晉陽學刊》1（2013），頁57-58。

<sup>17</sup> 劉成群撰：〈「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經學為敘述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86（2013.3），頁62-69。

<sup>18</sup> 顧永新：〈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頁106-111。



釋考察》<sup>19</sup>、〈納心於性——《四書大全》中雙峰一系的四書學》<sup>20</sup>，不同地域，不同學脈，各有發展，對於朱熹學術於宋元之際的情形，已有初步的觀察。朱熹之後，從分歧而終歸於一，學術以朱學為宗，乃是出於新安學人追尋的結果<sup>21</sup>，新安一系學人詮釋成果分量既多，成為後續必須梳理的工作，唯有如此，對於《四書大全》詮釋的內在理路，才有更為清楚的了解。

## 二、新安一系

朱熹（1130-1200）原籍為徽州婺源（今歸於江西省上饒市），二程祖籍也是徽州歙縣，徽州古名新安，新安成為宋代理學原鄉，學術承繼與鄉里情懷，滲透交融，程朱理學不僅是學術契合與儒學繼承的學術名稱，對於新安一地學人而言，更有鄉賢前輩典型所在的意義，深具尊仰信念與欣慕情懷。朱熹生前曾三次返鄉，第一次是紹興 20 年（1150）春，第二次是淳熙 3 年（1176）二月，第三次是慶元 2 年（1196）九月，不僅應邀講學，也收招學生，門人當中有許多是徽州人士<sup>22</sup>，學術傳播於朱熹生前即已進行，而於朱熹之後，從黃榦（1152-1221）而傳董夢程，流入於新安，全祖望云：「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sup>23</sup>成為學脈淵源所在，但以《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於程、朱之外，屬於新安人氏有王炎（1137-1218）、胡次焱（1229-1306）、程若庸、吳浩、陳櫟（1252-1334）、汪炎昶

<sup>19</sup> 陳逢源：〈「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孔子研究》153（2016.1），頁 51-64。

<sup>20</sup> 陳逢源：〈納心於性——《四書大全》中雙峰一系的四書學〉，《孔孟學報》94（2016.9），頁 27-64。

<sup>21</sup> 解光宇：《朱子學與徽學》（長沙：岳麓書社，2010），頁 3。

<sup>22</sup> 陳榮捷：《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13。清·施璜：《紫陽書院志》（合肥：黃山書社，2010），卷 8，〈列傳〉「論定高第，弟子十二人列於從祀」，頁 191。但事實上只有十一人，文字恐誤，分別為程洵、程永奇、汪莘、滕璘、滕珙、汪清卿、許文蔚、吳昶、謝璉、李季札、祝穆，參見卷 3，〈祀位〉所錄內容，頁 26-27。

<sup>23</sup> 〈介軒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稱〈新安學案〉，謝山始易為〈介軒〉。」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卷 89，頁 2970。

(1261-1388)、朱伸(疑為朱申)、胡炳文(1250-1333)、張存中、倪士毅等人,人數既多,其中顯然有更為複雜的學術脈絡。王炎,字晦叔,南宋婺源人,與朱熹、張栻(1133-1180)彼此相識相交。<sup>24</sup>胡次焱字濟鼎,號梅巖,晚號餘學,南宋婺源人,《四庫全書》收有《梅巖文集》,其人有陶潛栗里之風。<sup>25</sup>兩人學術樣態並不明顯。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饒魯(1193-1264)、沈貴瑤得朱熹之傳,舉咸淳4年(1268)進士,歷安定、臨汝、武夷書院山長,從遊者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在撫州號徽庵,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學者稱徽庵先生,撰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宋元學案》歸於〈雙峰學案〉。<sup>26</sup>吳浩字義夫,號直軒,休寧人,為吳錫疇次子<sup>27</sup>,吳錫疇從學於程若庸<sup>28</sup>,兩人雖然是新安人氏,但以其從學與發展,似乎可以歸之於雙峰一脈,可見新安學人也有屬於饒魯一系,學術流傳,新安既是程、朱祖籍所在,但初始階段,源頭既多,樣態紛雜,學術宗主並不明顯,亦可得見。朱申,字周翰,一字繼顯,號魯齊,新安人,官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為李心傳《道命錄》撰序,並有《周禮句解》,《宋元學案補遺》列於〈晦翁學案〉之中<sup>29</sup>,學術歸屬已較為明顯。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新安學繫錄》錄遺事八條<sup>30</sup>,學自家傳,父親胡斗元學於朱洪範,乃是上承朱熹後裔而及

<sup>24</sup> 〈王雙溪傳〉云:「王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先生張公帥江陵,聞而器之,檄於幕府,議論相得。」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卷6,頁127。《新安學繫錄》並收有王炎撰〈見南軒先生書〉、〈與晦庵先生論諒闇中開講書〉,頁129-132。彼此相識相交於此可見,小注「篁墩程氏曰:『世傳雙溪與朱文公不合,未見所出。』考《雙溪集》有〈與文公論諒闇開講〉事,《文公集》無答書,豈即謂此邪?」頁133。相較之下,王炎似乎較親近於張栻而遠於朱熹。

<sup>25</sup> 清·紀昀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卷165,「《梅巖文集》十卷」提要,頁3446。

<sup>26</sup> 參見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83,〈雙峰學案〉,頁2817;明·汪舜民纂修《(弘治)徽州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80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卷7,頁805。

<sup>27</sup> 吳浩事蹟見《(弘治)徽州府志》卷7〈人物志〉、《康熙休寧縣志》卷6〈人物〉、《宋詩紀事補遺》卷85〈吳浩〉條。

<sup>28</sup> 參見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83,〈雙峰學案〉,頁2827。

<sup>29</sup> 清·王梓材等撰:《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49,〈晦翁學案〉,頁183。

<sup>30</sup> 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卷12,〈胡雲峰〉,頁233-234。

伊洛學統，《宋元學案》列於〈介軒學案〉中「孝善家學」<sup>31</sup>，學有淵源，於此可見。此外，胡炳文整合歧出，撰成《四書通》，成為朱熹之後四書學的重要成果，鄧文原〈四書通序〉云：

《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余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眾，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臆說，以銜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峰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sup>32</sup>

後人各自揣想，於經文興發議論，時見新意，卻也時有誤解，紛雜多元的詮釋樣態，以糾彈朱熹說法作為個人研讀成就，不免混淆朱熹四書義理體系，形成詮釋困擾，既是當時普遍現象，有志之士思以改變，四書義理必須以朱熹思考為核心，才能避免淆亂，似乎是在學脈各自發展之後逐漸形成的學術趨向，《元史·儒學傳》直指胡炳文撰作動機乃是糾彈饒魯之失，對於朱熹之後學術歧出有深切的反省。<sup>33</sup>可見朱熹學術傳播漸遠，歧見彌多的情況下，固然有不同的詮釋，但一方面羽翼朱學的色彩也漸趨強烈，家學成為構建新安學脈關鍵詞彙，由傳學而發展，由發展而鞏固，重塑朱熹學術地位成為共同的訴求，影響之下，門人張存中，字德庸，婺源人<sup>34</sup>，擴大取證材料，補考據之不足，撰成《四書通證》，方向頗為相近，可以視為胡氏師徒推進四書詮釋的成果。<sup>35</sup>相同時間，陳櫟也進行類似的工作，陳櫟字壽翁，自號

<sup>31</sup>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89，〈介軒學案〉，列於「孝善家學」，頁 2986。

<sup>32</sup> 元·鄧文原撰：〈四書通序〉，見元·胡炳文撰：《四書通》，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

<sup>33</sup> 〈儒學〉云：「胡炳文，字仲虎，……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89，頁 4322。

<sup>34</sup> 參見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卷 16，頁 303。

<sup>35</sup> 「北方杜文玉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胡先生門人張存中德庸合二書，刪取而完正之，以為一書，曰：《四書通證》。」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凡例〉，《四書輯釋大成》，頁 2。

定宇，晚號東阜老人，休寧人。揭傒斯撰〈墓志銘〉云：

聖人之學，至新安子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沒，天下學士群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然朱子沒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櫟復生於新安，……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涵濡玩索，廢寢忘食，貫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於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sup>36</sup>

所謂「畔」而刊之，一如胡炳文的撰作宗旨，吳澄言「陳先生有功於朱子」，也一如「有功朱子，炳文居多」，可見在各立門戶，爭奇取異之中，回歸於朱學已是風勢所趨，陳櫟勤懇於鄉里之間，敦篤自守，回歸於撰作，樹立學風，無疑是新安學人的共同樣態，汪炎昶撰其〈行狀略〉云：

先生之學，得於家庭之講貫為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公常甫游。黃公之學出於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為朱子高第，其流風遺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泳之，故其所就益精深且醇正也。……於書無所不讀，讀則一一反覆研究，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為本，坐臥諷詠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用意，涵濡既久，簡牘斯形。<sup>37</sup>

學術可以溯及朱熹門人，家學淵源，歸於朱熹，學術具有根柢，同樣一如胡炳文承其父而上溯於朱熹後裔，重視學術傳承，回歸於家學淵源，強調鄉里之教，落實於躬行實踐之中，敦篤傳學，歸於四書義理的體會，這些描述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具有時代與區域的共性，宗主朱熹學術的訴求，四書經典化，於新安學脈已見端倪，《新安學繫錄》錄遺事八條，其末云：「定宇先生號朱子世適，而學不為空言。凡著書，

<sup>36</sup> 元·揭傒斯：〈墓志銘〉，收入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卷 12，〈陳定宇〉，頁 224-225。

<sup>37</sup> 元·汪炎昶：〈行狀略〉，收入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卷 12，〈陳定宇〉，頁 226。案：「故定宇先生陳公，為吾鄉大儒，號朱子世適，而學不為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補于道。」明·程敏政：〈跋陳定宇先生小學字訓註〉，《篁墩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38，頁 29。

要必有補於道。」<sup>38</sup>承朱子世適，乃是綜合家學、道統的評論，新安人學者有以自許，立場更為明確，主張更為鮮明，甚至彼此互通，相互支持，例如同鄉汪炎昶。汪炎昶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為古逸先生，持身為學，老而不倦，卓有風範，趙汭撰〈行狀〉云：

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採擇群書，發揮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汲汲於成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居家著書，嘗請先生所注《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惟不護疾忌醫，是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言（應作「年」）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sup>39</sup>

陳櫟與汪炎昶因四書而論交，成果彼此分享，毫無自滿自矜之念，一秉學術為公態度，令人欣賞，而其氣度所在，正是新安學人的特色，趙汭〈行狀〉云：

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以朱子為宗。其議論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及從先生游，然後知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風遺韻，莫不皆有所自云。<sup>40</sup>

新安學人以朱熹為宗，傳其學術，遂有單純的信念，其中有鄉里宗族情誼，但顯然也有宋亡之後，深寓宗國文明之傳的情懷，朱熹學術成為凝聚鄉里情感共同文化符碼，從以往各立宗旨，各自引伸的進路，轉而成為蒐羅前人見解，持守深化的思考，切身體證，形構新安學人學術特色，甚至成為師門之間，共同追尋的目標，陳櫟門人倪士毅即承師命撰《四書輯釋》，師門之間，學術傳承，一如胡炳文與張存中。倪士毅字仲弘，隱居徽州祁門山，朝夕講學，一生不仕，學者稱道川先生，學術師承

<sup>38</sup> 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卷12，〈陳定宇〉，「遺事」，頁230。

<sup>39</sup> 元·趙汭：〈汪古逸先生炎昶行狀〉，見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71，頁2-3。

<sup>40</sup> 元·趙汭：〈汪古逸先生炎昶行狀〉，見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14冊，卷71，頁4。

陳櫟，而「素論定于郡先師朱子」，《宋元學案》列於〈滄洲諸儒學案〉。<sup>41</sup>趙東山〈墓志〉云：

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友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注書曰《四書輯釋》，閩坊購其初稿刻之。嘗別為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稿，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sup>42</sup>

於世變之中，卓然自立，切己修養，鄉野設教，立身行事，以朱學為宗，新安學人正是循朱熹儒學精神，落實於生命實踐之中，檢覈《四書輯釋大成·凡例》云：

先師定宇陳先生（諱櫟，字壽翁）方編《四書發明》，時星源雲峰胡先生（諱炳文，字仲虎）亦編《四書通》，彼此雖嘗互觀其書之一二而未竟也，既而二書因學者傳入坊中，皆已板行。先師晚年頗欲更定其書而未果，及見《四書通》全書，遂手摘其說，蓋將以附入《發明》，若《大學章句》，則嘗下筆發其端矣，餘未之及。士毅不揆淺陋，亦嘗僭欲合二書為一，以自便觀讀。先師可之。元統甲戌春二月。先師考終，心喪既畢，乃即二書詳玩，且以先師手摘者，參酌而編焉，名曰《四書輯釋》，所擬凡例，條具于後，狂僭之罪，固不可逃，尚願謀之同門，以廣質于遠近諸明理君子，更加商訂，而求真是之歸，則愚於此實拳拳云。至元三年丁丑歲春三月八日己酉，門人倪士毅謹識。<sup>43</sup>

陳櫟既卒，倪氏繼承「先師之遺志」，匯整《四書發明》與《四書通》，以備參考，撰成《四書輯釋大成》，始於元統2年（1134），成於至元3年（1137），嘗試在朱熹之後，整合新安兩系內容。在陳櫟過世之後，倪氏有意成就師門學術事業，確立新安一系學術成果，動機在於師承傳續，無怪乎屢屢以「先師」為念，志懷深矣。事

<sup>41</sup>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70·〈滄洲諸儒學案下〉，列於「定宇門人」，頁2359。按：依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卷14，「倪道川」趙東山撰〈墓志〉云：「其卒以戊子歲四月九日，年四十有六。」頁256。則其生為元武宗大德7年（1303），卒為元順帝至正8年（1348）。

<sup>42</sup> 元·趙東山：〈墓志〉，收入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卷14，〈倪道川〉，頁264-265；元·趙汴撰：〈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誌〉，見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14冊，卷71，頁26-27。

<sup>43</sup> 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凡例〉，《四書輯釋大成》，頁1。

實上，以〈引用姓氏書目〉末言「仍續增」<sup>44</sup>，可見倪氏仍然意猶未愜，之後又續有整理，完成進一步重訂工作，於此成果，汪克寬撰〈重訂四書輯釋序〉言其緣由，云：

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祕，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蓋皦皦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並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注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趙氏、蔡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際，未為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審，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銜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鉅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歎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別繁複，缺略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磨刮向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弘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劇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倂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sup>45</sup>

朱熹匯整周、張、二程，成就四書義理體系，而自朱熹之後，四書詮釋附入朱熹本身言論，以朱注朱，用意在於確認朱熹思考內容，屬於第一階段；之後參酌門人弟子之言，相互補充，進一步擴大詮釋細節，乃是用以證明朱熹注解的內涵與價值，則是第二階段，凡此皆屬朱門學術系統之中，然而之後，各自闡釋，各自揣想，歧見漸出，於是家自為學，人自為書，紛雜迷亂，後人匯整之餘，不免有檢擇未精之失，於是求「全」與「精」，成為南宋以下元儒《四書》詮釋必須突破的困境，也是

<sup>44</sup> 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輯有〈四書輯釋大成引用姓氏書目〉，有「依《纂疏集成》引用」14家，「依《發明》、《通》引用」有74家（二程列為兩家），頁1-3。成為《四書大全》整理朱熹之外，共105家徵引材料的基礎。參見陳逢源：〈《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東吳中文學報》23（2012.5），頁222。

<sup>45</sup> 明·汪克寬：〈重訂四書集釋序〉，《環谷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4，頁7-8。

朱熹學術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汪氏言其脈絡，得見四書學發展情況，也得見新安一系學人用心所在，陳櫟、胡炳文各自成書，卻有相同的訴求，並非偶然，倪氏匯整二書，乃是循此脈絡的結果。從而可見，南宋以來，新安一系學者四書研究，遂有完整文本，各自歧出的詮釋，終於有回歸於朱熹本身學術的檢擇內容，重視四書中的道統脈絡，以注擬經，提出「詞意渾然猶經」，申明護衛朱熹學術的主張，無疑是其中最為核心的見解，以道統自許，成為一種學人之間共同的學術信念。<sup>46</sup>原本鄉里宗族之間尊仰先賢的情懷，學人鄉里設教，立身操持的個人體驗，從而成為彰顯四書經典意義，以及朱熹學術宗主地位的重要依據。從初刊到重訂，比對前後序文之間，宗奉師門之命，擴大為解決朱熹之後四書發展問題，淵源脈絡更為清楚，詮釋遂有不同方向。南宋既亡，儒者於堅守傳統之中，剔除疑義，重新回歸於朱熹義理，確立四書經典價值，倪士毅撰成《四書輯釋》成為明儒《四書大全》建構官學系統的基礎，《四書大全》固然有明成祖總攬天下，肆行政教一體的個人意志，但其實也有傳承自宋、元之際新安學人學術發展隱藏的內在脈絡，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序〉云：

新安為程子之所從出，朱子之闕里也。……由宋而元，以至我朝，賢賢相承，繩繩相繼，而未嘗泯也。蓋朱子之沒也，海內學士群起著書，爭奇銜異，各立門戶，浸失其真。諸先哲秉相傳之正印，起而闕之。故筆躬行之實，心得之妙，乃於聖人之經，濂洛諸書，具為傳注。究極精微，闡明幽奧，朱子所未發者，擴充之；有畔於朱子者，刊去之，由是朱子之學煥然於天下。我太宗皇帝詔修《五經》、《四書》、《性理》，憲宗皇帝詔修《資治通鑑綱目》，一惟其言是宗。採錄之以明聖經，淑人心，維民極，而垂教後世，則其功於聖道正學大矣哉！<sup>47</sup>

新安學術來源紛雜，傳承之間，家學為多，然而自宋及元，新安學人昂然自立，起

<sup>46</sup> 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2009.6），頁43-113。以地域研究的角度，建構學術發展的觀察。史甄陶建構新安諸儒傳經的觀察，見氏著：《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1-3。

<sup>47</sup> 明·程瞳撰：〈新安學繫錄序〉，《新安學繫錄》，頁1。



而捍衛朱學正印，分歧而歸一，於鄉里之間，躬行實踐，最終形塑理學原鄉意識，新安學出於明人建構的結果，固無可疑，但線索所在，早已存於明初官修數部經解之中，隱而漸顯，由《四書輯釋》而及《四書大全》，正是其中關鍵所在。

### 三、徵引情形

倪士毅《四書輯釋》代表新安學人四書詮釋成果，《四書大全》承《四書輯釋》遂承接續新安一系學脈，成為明儒建構學術精神所在，徵引新安學人剔除歸於饒魯一系的程若庸、吳浩之外，其餘共計八人，情形如下：

新安學派						
姓名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加總	百分比
陳櫟	102	116	524	427	1169	19.83
倪士毅	4	7	28	31	70	1.19
胡炳文	39	84	208	150	481	8.16
張存中	2	2	3	0	7	0.12
王炎	0	4	0	0	4	0.07
朱申	0	3	0	0	3	0.05
胡次焱	0	0	2	0	2	0.03
汪炎昶	0	0	4	0	4	0.07
加總						29.52

相較於北山一系徵引 154 條，佔 2.61%<sup>48</sup>，雙峰一系徵引 662 條，佔 11.22%<sup>49</sup>，新安一系徵引 1740 條，佔 29.52%，比例最高，可見於朱熹之後，學脈旁出，學術層遞發展，新安學人的四書成果，分量最多，具有總結地位。於此可見，新安一系做為《四書大全》徵引主要來源，比較數量，其中以陳櫟最多，其次為胡炳文，之下為倪士毅、張存中，又分別為陳、胡門人，至於王炎、朱申、胡次焱屬於新安前期

<sup>48</sup> 陳逢源：〈「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頁 55。

<sup>49</sup> 陳逢源：〈納心於性——《四書大全》中雙峰一系的四書學〉，頁 45。

人物，汪炎昶為陳櫟友人，乃是相關而及的學人，徵引數目並不多，可以附帶檢討，進一步檢討，《四書大全》中新安學脈乃是循陳櫟、倪士毅，以及胡炳文、張存中而開展，則無可疑，而陳櫟、倪士毅師徒徵引數目是胡炳文、張存中一倍以上，佔數目之絕大多數，也是顯而易見。事實上，陳櫟與胡炳文在四書詮釋方面，有尊仰朱注的共同原則，但細節之間，也有些許不同，主要有兩個歧出方向：

### （一）對於饒魯立場不同

北山與雙峰兩系，代表朱學開枝散葉的結果，《宋元學案》黃百家按語云：「黃勉齋榦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何北山基，以遞傳于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于江右傳饒雙峰魯，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學，可謂盛矣。」<sup>50</sup>饒魯是朱熹之後重要的理學大家，學術由黃榦而上溯朱熹，只是發揮之餘，往往有不同於朱熹的見解，全祖望於案語云：「說者謂雙峰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sup>51</sup>反映時人對此的疑惑，胡炳文於此深有批判，《孟子集註大全·滕文公章句上》「夫道一而已矣。」引胡炳文云：

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也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sup>52</sup>

饒氏執著字義，性指稟性，道指所由，各有所指，所以對於朱熹以性解道，認為釋義並不正確，然而胡氏於此提醒，朱熹注解乃是循上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來，不僅符合經文語脈，而且性外無道，循性而得道，朱熹以「同性」解「同道」，直指途徑，性無二本，道無二途，由性而道，軌轍正確，乃是洞悉孔門心法，義理精熟的結果，朱熹掌握儒學要義，釋義沒有偏差，饒氏過執而偏，胡氏分析極為正確。相較之下，陳櫟、倪士毅師徒對於饒魯的態度則是較為和緩，少有批判，《論語

<sup>50</sup>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83，〈雙峰學案〉，頁 2812。

<sup>51</sup>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83，〈雙峰學案〉，頁 2811。

<sup>52</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卷 5，〈滕文公章句上〉，頁 2332。

集註大全·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章，引胡炳文云：

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寢長卻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有悞後學，不可不辨。<sup>53</sup>

「慎獨」因避南宋孝宗諱作「謹獨」，饒氏認為小、大有別，大學方有慎獨之事，而小學洒掃應對，僅是維持其心，然而胡氏強調朱熹「理一分殊」之說，由分殊以見理一，乃是朱熹接引李侗道南指訣所在<sup>54</sup>，分殊與理一並不是截然兩端，而是由此見彼，由彼見此，洒掃應對同樣也可以練就慎獨，慎獨是心體的工夫，而非學習的階段，於此彰顯朱熹學術規模既大，但工夫推究入微，義理融通一致，並無分別分段問題，然而對此，陳櫟卻有不同看法，云：

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sup>55</sup>

陳氏認為程子說解《論語》與《大學》、《中庸》應有不同，前者是日用之間的事，後者關乎規模與境界，同屬聖人之學，但有不同旨趣，既是謹小事，也無所謂工夫入神的問題，小學階段，思慮未及，實在無法強求工夫到位，直究理一之境，獲致心體澄朗之效，見解反而傾向於饒魯。對於饒魯態度，胡炳文、陳櫟兩人顯然不同調，影響之下，倪士毅似乎對於饒魯並不十分排斥，饒魯將朱熹《中庸章句》三十三節分出六大節的見解，也為倪士毅所接受，成為詮釋義理架構。<sup>56</sup>原本胡氏排斥

<sup>53</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9，〈子張篇〉，頁1994。

<sup>54</sup> 陳逢源：〈「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183-195。

<sup>55</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9，〈子張篇〉，頁1994-1995。

<sup>56</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於第一章下引饒魯云：「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

饒氏立場，至陳櫟、倪士毅師徒顯然已有所修正。

## （二）對於定本判斷有異

朱熹以一生之力，撰成《四書章句集注》，臨終前為《大學》「誠意」章費心竭慮，更是人所熟知之事<sup>57</sup>，孰為最後定本，自然成為後代注家必須留意之處，倪士毅於《四書輯釋大成·凡例》言其師撰有《四書考異》一卷，依朱熹之孫朱鑑意見，興國本為晚年絕筆所更定本，祝氏附錄即是依興國本，其他皆為舊本，相關成果，散入於《四書輯釋》各節之中<sup>58</sup>，《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章，引陳櫟云：

諸本皆做「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箒。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語，

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大節。」頁 352。第十一章下引饒魯云：「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一大節。」頁 380。第十九章下引饒魯云：「以上八章，自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為第三大節。」頁 435。第二十六章下引倪士毅云：「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頁 498。第三十二章下引倪士毅云：「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第五大節。」頁 530。第三十三章下引倪士毅云：「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頁 544。倪士毅承饒魯分節之安排，於此可見。

<sup>57</sup> 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6，「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頁 2。蔡沈《朱文公夢奠記》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午後，大下，隨入宅堂，自是不能復出樓下書院矣。」見明·蔡有鵬輯，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卷 6，頁 793。不過錢穆依江永之說，朱熹最後所改其實並非《大學》「誠意」章，而是《大學》「誠意」二字最先見處之注，將經一章原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中「一於善」改為「必自慊」。氏著：《朱子新學案》第 2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 425。

<sup>58</sup> 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凡例〉，《四書輯釋大成》，頁 2。

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慊」對「無自欺」，只以傳語解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況《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sup>59</sup>

其中涉不同版本的判定問題<sup>60</sup>，陳氏看重的原因來自於朱熹嫡孫朱鑑的背書，另一方面則是「一於善」與「必自慊」義理層次的分析結果。兩者同屬於朱熹注解，然而何者更切中最終意見，則涉及朱熹義理進程的判斷，「一於善」強調心之所發，真實而良善，固然有純粹不二的訴求，只是實心於善，仍不免令人有善自外來，必須把捉不失的疑慮，不如「必自慊」，符合《大學》「誠意」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經文原本語意脈絡，而且也更符合善自內發，充盈無失樣態的描述，語意渾成自然。事實上，就以朱熹本身言論而言，也是以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對舉，可見最終改定，乃是貼合經文語意渾然充盈的說解，校正之處，包括《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章，針對朱注「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引陳櫟云：

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興國本作「察」，他本作「審」者非。<sup>61</sup>

主要是呼應前文朱注「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陳櫟直指「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sup>62</sup>文字校正，更關乎前後語意銜接，於此證明興國本作「察」有其理據，也反證他本為非，追尋定本，成為陳櫟關注重點，對四書義理體系有更深的體會，遂能掌握朱熹思想的進程，《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天命之謂性」章，引陳櫟云：

<sup>59</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頁 45。

<sup>60</sup> 按：依〔日〕佐野公治：《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則是分為淳祐本與興國本兩系統，使用淳祐本系統宋代有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元代有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胡炳文《四書通》，胡炳文認為淳祐本系統是傑出的文本。至於依據興國本系統則有祝洙《四書附錄》、元代則有陳櫟《四書發明》、倪士毅《四書輯釋》。頁 188-189。

<sup>61</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頁 98。

<sup>62</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頁 95-96。

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之，疏密淺深，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sup>63</sup>

陳氏所引元本，即是今本文字，相對於定本，所指為初本、原本之意<sup>64</sup>，至於《中庸章句大全》作「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sup>65</sup>則是出於祝氏《附錄》，乃是陳氏認為的定本，兩者同出於朱熹，但孰為最後版本，明清兩代有不同的判斷。<sup>66</sup>比較「人之所

<sup>63</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頁 335-336。

<sup>64</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 8，〈離婁章句下〉引陳櫟云：「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頁 2604），同樣也是作「元文」。

<sup>65</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頁 333-334。

<sup>66</sup> 吳英〈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云：「此節注要義在此，故下文『子思於此首發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學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乃是勉勵之辭。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尚覺粗淺而未及精深，況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雖似整齊，而仍於第一句遺『命』字，於第三句遺『道』字，文亦未能盡依。董子所謂『道之大原』云云，為知言則可矣；若引來證《中庸》此節，則為偏重『本於天』意，而未及『備於我』意，則是仍未免遺卻親切一邊意矣。定本與未定本相較，雖皆朱子之筆，而盡善與未盡善懸殊。」收入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附錄》（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頁 384-385。其中涉及文字內容判斷，以及義理相應之思考，清人對於《四書大全》殊無好感，視為坊本所由來，所謂之定本，正與《四書大全》相反。

以為人」與「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道之所以為道」與「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聖人之所以為教」與「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今本文字較為簡潔明快，然而後者剖析緣由，著力於性、道、教彼此聯結，由事而道，由道而性，由性而天，而聖人因之，歸本於因吾之所固有，天地之間，遂有大本。陳氏特別強調自舜、湯、孔子以來，以至於子思、朱熹，漸次顯豁，道統最終得以彰顯之意義，定本不僅聯貫概念，也從而彰顯歷史傳承現象。追尋定本，更在於細節之中得見朱熹周延的思考，倪氏尊從其師，反對胡炳文《四書通》，以祝氏《附錄》為定本，乃是在朱熹之後不同流傳文字當中，尋求朱熹最終之解的結果。倪氏觀察有其理據，也有版本依據，《四書大全》徵引新安一系學人詮釋成果，也保留不同立場的材料。

## 四、強化學脈與道統

新安學術從原本理學流扇之地，轉而成為理學原鄉。宋元之交，新安學人宗奉鄉賢前輩，以朱熹為依歸，乃是在學脈各自分化之中確立學術宗傳的結果。新安學人求「全」與「精」之餘，胡炳文師友與陳櫟師友兩系，固然有相歧之處，但也有相同的原則，融通匯整，重視淵源，留意細節，在經與注之間，得見朱注擬經的價值。

### （一）揭示注解原則

新安學人切己操持，對於經典內涵與朱熹注解關注更深，遂能發凡起例，歸納原則，大有助於後人了解朱熹經注之間的思考，撮舉其要，例如《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於「右經一章」下，朱注「凡傳文雜引經傳」引陳櫟云：

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

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sup>67</sup>

注解為難之處，在於何者當注，何者可以不注，其中的分際，來自於注家對於文本的掌握，以及對於後人理解引導的判斷，然而朱熹注解之細緻，新安學人深有信心，不釋之處可以自所釋之處得之，詳略之間，出於敏銳細膩的觀察，以及實際檢驗的結果。《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於「其本亂而未治」下引胡炳文云：

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sup>68</sup>

工夫、功效，逆推、順推，朱熹對於經文有多層次的梳理，經與注相互配合，遂能從中得見經文義理脈絡，以及朱熹注解的結構。《四書大全·讀論語孟子法》於「程子曰」下引陳櫟云：

程伯子諱穎，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sup>69</sup>

朱熹以程子為稱，取代以往分別兩人的習慣，此一細節，前人少有留意，而關乎朱熹學術重要進程，以及對於二程義理融鑄的結果，陳氏之言，提供非常重要的線索，大有助於了解朱熹用意所在。<sup>70</sup>《論語集註大全·子罕篇》「可與共學」章，引胡炳文云：

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

<sup>67</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頁 55。

<sup>68</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頁 54。

<sup>69</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讀論語孟子法》，頁 755。

<sup>70</sup> 參見陳逢源：〈「縱貫」與「橫攝」——朱熹徵引二程語錄之分析〉，《「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頁 174-178。



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sup>71</sup>

朱熹宗奉二程，然於其說法，每有調和增補，以求周全，朱熹既繼承二程，又深化二程，於此可見，後人以程、朱為稱，往往視為一體，殊不知其中的分別與進程，錢穆先生以「釋回增美」來說明朱熹成就，正是得見其中發展。<sup>72</sup>程、朱為新安一系的學術核心，考察既密，遂能得見線索。又如《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序說》引胡炳文云：

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sup>73</sup>

朱熹援取《史記·孔子世家》，然而刪取之間，可以一窺關注重點，朱熹深有宗國情懷，乃是無庸置疑之事，然而於宋元之際，新安學人特加留意，既是深刻而敏銳的觀察，寓有家國感慨乃是切身真實的感受。又如《論語集註大全·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愠」章，引陳櫟云：

《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sup>74</sup>

朱熹將北宋以來諸儒講論成果，融鑄於注解當中，體例極為特殊，解釋經旨之外，又言其義理。然而意猶未竟，又有徵引，則加圈區隔，於此方式，義理更為飽滿，詮釋更具層次。凡此皆是朱熹注解細節，新安學人細加梳理，遂有結構性的觀察。<sup>75</sup>

<sup>71</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9，〈子罕篇〉，頁1403。

<sup>72</sup> 「朱子評程氏門人」云：「朱子學問與年俱進，乃能由二程而識破程門諸子之病失所在，復能由《論》、《孟》、《學》、《庸》四書而矯糾二程所言之亦有疏誤。釋回增美，以之發揚二程之傳統，誠朱子在當時學術界一大動績也。」錢穆：《朱子新學案》第3冊，頁217。

<sup>73</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序說》，頁771。

<sup>74</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1，〈學而篇〉，頁792-793。

<sup>75</sup> 參見陳逢源：〈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319-323。

## (二) 分析更臻於密

朱熹建構四書義理體系，反覆錘鍊<sup>76</sup>，以往各自揣想，新意時見，卻也不免有歧出之處，新安學人回歸於朱熹思想，在經注之間，切己躬行，更能體會朱熹深刻的思考，遂能得見朱注之精彩，《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於朱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引胡炳文云：

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sup>77</sup>

朱熹於四書當中，各有安排，《論語》、《孟子》關乎於用，因此留意是「時中」之義，解釋為「無過不及」，至於《中庸》則由「未發」而及「已發」，乃是從根源上說，兼有體用，因此補入「不偏不倚」，兼及體用，釋義之巧妙與細膩。於此可見，唯有通讀四書，了解朱熹安排義理架構，才能真正掌握注解之內涵<sup>78</sup>，因此陳櫟將此置於體用之間來思考，云：

「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sup>79</sup>

胡氏言「不偏不倚」兼有體用，陳氏則以為此乃心之狀態，乃是中之體，至於以事而論，則是言其用，心求其不偏不倚，事求其無過不及，分別內外體用，更為清晰，說法可以相互補充，層面更為周延。《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於「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章，引胡炳文云：

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

<sup>76</sup> 參見陳逢源：〈集注與章句：朱熹四書詮釋的體例與方向〉，《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199-218。

<sup>77</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頁 325。

<sup>78</sup> 陳逢源：〈道統與進程：論朱熹四書之編次〉，《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168-169。

<sup>79</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頁 325。

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sup>80</sup>朱熹釋義之巧妙，乃是對於經文的全然掌握，務求詮釋圓滿，「中庸」之中，具有「中和」之義，因為必須由內而及外，由體而及用，從未發而及已發，所以朱熹說解也先從「不偏不倚」狀其體段，以「無過不及」言其形態，層次井然，一字一句，皆有安排。《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致中和」章，引胡炳文云：

《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sup>81</sup>

「精之」、「約之」乃是針對修養工夫的提醒，如何達致「中和」之境，既是心體的狀態，又是應物處世結果，朱熹分別而言，務求融通一貫，因此陳櫟云：「收斂近裡貴乎約，審查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sup>82</sup>操持之間，精準細膩，遂能闡發幽微，得見經文旨趣。《論語集註大全·子路篇》「君子泰而不驕」章，引胡炳文云：

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sup>83</sup>

引倪士毅云：

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sup>84</sup>

釋義必須依經旨，然而不同文本，相同詞語有不同的內涵，「泰」與「驕」對言，「泰」為循理而安舒，「驕」則縱欲而矜肆，然而「泰」與「驕」合言，則「泰」與「驕」

<sup>80</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頁 353。

<sup>81</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頁 347。

<sup>82</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頁 347。

<sup>83</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 13，〈子路篇〉，頁 1653。

<sup>84</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 13，〈子路篇〉，頁 1653。

為一類，矜高侈肆，朱熹分別其中，以求符合經文旨趣。至於《論語》用「矜肆」，乃是綜納《大學》「矜高」與「侈肆」語意的結果，四書義理融貫，文字語意之間，也務求條理貫串，一字一句，絲毫不苟，唯有深入於注解細節，通貫全篇，參酌比對，才能發現朱熹分析之密，釋義之精。《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引胡炳文云：

《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sup>85</sup>

朱熹〈中庸章句序〉首揭「道統」，然而與〈大學章句序〉有相同脈絡，卻有不同的層次與思考，《大學》言「誠意、正心」，於〈大學章句序〉標舉其「性」，以明根源，三綱、八目最終目的就是復其本「性」；《中庸》言「中和」、「至誠」，〈中庸章句序〉揭示「道心」所在，儒學境界高遠，必須回歸於「道心」的操持，既補充，又標示源頭，序文各自表述，又相互關聯，大有助於了解《四書章句集注》之精彩，心性為儒學要義，凡此皆是推究入密，才能得見朱熹安排的巧思。

### （三）留意道統淵源

新安學人重視家學傳承與師門淵源，也就特別注意道統所在，《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於最末引胡炳文云：

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sup>86</sup>

朱熹於《大學章句》之末云：「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sup>87</sup>第五章即是「格致補傳」，第六章為「誠意」章，朱熹特別揭示兩章之價值，以茲為修養之要，然而「明善」、「誠身」既是《大學》核心要義，又見於《中庸》，也見於《孟子》，朱熹揭示儒學工夫，胡氏卻得見孔門心法中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相傳線索，朱熹串貫巧思，於此揭示。《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徵

<sup>85</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 318。

<sup>86</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大學章句大全》，頁 144。

<sup>87</sup> 宋·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13。

引內容集中於新安一系學人，於命篇旨趣引胡炳文云：

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為聖爾。況中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一貫也。<sup>88</sup>

由六經而及四書之道統脈絡，乃是其中存在堯、舜相傳線索，孔門施教內容，紛雜之中，聖聖相承，條理井然，《論語》的意義，〈堯曰〉一篇，點出「允執其中」，得見〈虞書〉舜之三言，乃是承堯之一言，而《孟子》有「湯執中」，則可見其中一脈相承，孔子的一貫之道，曾子忠恕以達一貫，若合符契的暗示，確立儒學核心要義，陳櫟云：

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sup>89</sup>

其中涉及偽古文《尚書》辨偽工作，乃是清人學術用力所在，牽涉既廣，非本文所能處理，然而新安學人從中得見朱熹學以究三代，工夫存著於心的思考，大有助於儒學內涵的確立，細節之中，反覆致辯，引胡炳文云：

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sup>90</sup>

所論為《論語·堯曰》中「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一章<sup>91</sup>，深有孔子的暗示，而引陳櫟云：

<sup>88</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 308。

<sup>89</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 313。

<sup>90</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 314。

<sup>91</sup> 宋·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卷 10，〈堯曰〉，頁 193-194。

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sup>92</sup>所指為《孟子·盡心篇下》最末「由堯舜至於湯」一章<sup>93</sup>，孔子、孟子相互契合，同指聖聖相傳線索，四書價值，正是孔、曾、思、孟心法相傳所在，胡炳文云：

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sup>94</sup>

引陳櫟云：

顏氏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sup>95</sup>

循朱熹道統架構，新安學人深有衍繹，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相傳，正是四書義理之內涵，朱熹於儒學當中置放道統，於孔門當中鋪排心法，陳櫟云：

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sup>96</sup>

新安學人於此細節，反覆推敲，致意之深，推究之密，於此可見。事實上，不僅止於〈中庸章句序〉，凡所涉及聖聖相承者，無不留意，《論語集註大全·堯曰篇》「舜亦以命禹」章，引陳櫟云：

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其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

<sup>92</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314。

<sup>93</sup> 宋·朱熹：《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卷14，〈盡心章句下〉，頁376-377。

<sup>94</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314。

<sup>95</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314。

<sup>96</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序》，頁316。

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sup>97</sup> 標示聖聖相傳之內容，孔子之所傳，得此證明。《孟子集註大全·滕文公章句上》「孟子道性善」章，引胡炳文云：

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sup>98</sup>

孔子言善性，乃是從造化發育來說，至於子思則是從根源處說，孟子直指性善，簡潔明白，直到二程言性即理，分判更為清晰，聖賢相繼，說法相承，義理更為明朗，性善一端為孔門心法，孟子有功於儒門，二程有功於孟子，孟子地位於此可見，二程繼之而起的地位，亦從而得見，新安學人結合道統與性理，聖賢相繼因而延伸，絕學遂有繼承。於此引陳櫟云：

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者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歟！<sup>99</sup>

二程以及朱熹，正是新安學人鄉賢前輩學術信仰所在，言其理於前，列其事於後，

<sup>97</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卷20，〈堯曰篇〉，頁2017-2018。

<sup>98</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5，〈滕文公章句上〉，頁2330-2331。

<sup>99</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5，〈滕文公章句上〉，頁2331。

彰顯聖人之教，新安學人之細心，於此可見，《小學》切己操持，正是新安學人關注的學術工夫，鋪排補綴，饒有意義。《孟子集註大全·盡心章句下》於最末，引胡炳文云：

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sup>100</sup>

引陳櫟云：

朱子繫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後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sup>101</sup>

朱熹標舉二程，繼承孟子絕學，建構儒學聖賢相傳的歷史意象，一抒個人的終極情懷，黃榦撰〈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以「道統」表彰朱熹學術成就<sup>102</sup>，乃是朱熹之後門人努力的重點<sup>103</sup>，而以《四書大全》徵引內容而言，抉發其中細節，將「道統」與四書義理縝密結合，進而深化程、朱於道統續傳之地位，則有賴於新安學人矣。

<sup>100</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 14，〈盡心下〉，頁 3041。

<sup>101</sup>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大全》，卷 14，〈盡心下〉，頁 3041。

<sup>102</sup> 宋·黃榦：〈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88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卷 6554，頁 350。

<sup>103</sup> 〈跋道統錄〉云：「『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宋·王柏：《魯齋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11，頁 166。



## 五、結論

宋元之際，新安學人宗奉朱熹，學術回歸於切己操持，對於四書用力既深，學行更為可觀，「新安學」雖出於明人表彰<sup>104</sup>，但於《四書大全》當中，導夫先路，已有十分明顯的學術線索。《四書大全》所載錄新安學人內容，分量既多，線索紛雜，卻隱然存在學術脈絡，追求定本、消弭歧出，從而確認朱熹為四書義之核心，從而發凡起例，歸納朱熹注解樣態，分析入裡，得見朱熹思考細節，在切己操持中，更能體會朱熹思索之細膩，注解的周全，尤其留意其中道統內涵，強化儒學歷史傳承意義，朱注價值於此彰顯，朱熹地位由此建立，明代四書學宗朱色彩，即在其中形成，清人吳曰慎〈新安學繫錄序〉云：

朱子以遷閩未久，新安自表，而吾郡繼起諸賢，篤守其學，代不乏人，其與金谿之頓悟、新會之靜虛、姚江之良知，不啻薰蕕判也。是以道統歸於程朱三夫子，而學系之正，莫如新安，故獨標之。<sup>105</sup>

新安學人之堅持，深有特色，學術之篤厚，於此可見。整理《四書大全》徵引新安學人之內容，有如下心得：

（一）《四書大全》承襲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多，乃是揀擇之後的結果，倪士毅《四書輯釋》匯整陳櫟《四書發明》與胡炳文《四書通》，胡氏、陳氏、倪氏三人皆為新安人氏，新安一系成為《四書大全》徵引材料之大宗，既是四書官學化中極為重要的發展環節，也是了解明代四書學義理基礎必須釐清的內容。

（二）《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於程、朱之外，屬於新安人氏有王炎、胡次焱、程若庸、吳浩、陳櫟、汪炎昶、朱伸（疑為朱申）、胡炳文、張存中、倪士毅

<sup>104</sup> 新安學術出於明人建構的結果，元末趙汭撰〈商山書院學田記〉云：「一以先師朱子為歸。凡六經傳注、諸子百氏之書，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為教，子弟不以為學也。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推新安之士務然。」見元·趙汭：《東山存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4，頁287。程瞳《新安學繫錄》則撮舉101位徽州學者，足可證明新安一系學人學術所向。參見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序〉，《新安學繫錄》，頁1-3。

<sup>105</sup> 清·吳曰慎：〈新安學繫錄序〉，明·程瞳：《新安學繫錄》，頁4-5。

等人。剔除歸於饒魯一系的程若庸、吳浩之外，其餘共計八人，徵引 1740 條，佔 29.52%，朱熹之後，學脈旁出，學術層遞發展，新安學人的四書成果具有總結地位。

(三)《四書大全》徵引新安學人詮釋內容，其中以陳櫟最多，其次為胡炳文，之下則為倪士毅、張存中，又分別為陳、胡門人，至於王炎、朱申、胡次焱屬於新安前期人物，汪炎昶為陳櫟友人，乃是相關而及的學人，徵引數目並不多。《四書大全》中新安學脈乃是循陳櫟、倪士毅，以及胡炳文、張存中而開展，對於饒魯雙峰學的態度，以及追尋定本的判斷，意見顯然有其差異。

(四)新安學人求「全」與「精」之餘，胡炳文師友與陳櫟師友兩系，固然有相歧之處，也有相同的趨向，匯整融通，重視淵源，展現更為細膩的詮釋觀察，包括發凡起例，歸納朱熹注解原則，回歸於經注之間，了解朱熹用字之不苟，將「道統」與四書義理縝密結合，進而深化程、朱於道統續傳之地位，皆可見新安學人用心所在。

(五)明人四書學以朱熹為依歸，乃是出於宋元之際儒學特殊的發展，家國之思移於鄉里宗族，理學回歸於切己操持，新安學人宗奉朱熹，對於四書用力之深，篤厚為學，成為明儒義理詮釋的基礎。新安學術從原本理學的流扇之地，轉而成為理學原鄉，道統的堅持更成為明成祖建構政教一體的依據所在，朱熹之後學術發展，遂有較為清楚的脈絡。

《四書大全》中新安學系，材料既多，牽涉又廣，梳理為難，反覆檢視，遂能得元明之際儒學發展的軌跡。朱熹之後，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學術發展，各有發揮，既具精彩，也更增分歧，新安學人於艱困之地，深具尊仰信念與欣慕情懷，朱熹學術成為凝聚鄉里情感文化符碼，標舉朱熹學術為宗，具有化解分歧的意義，從以往各立宗旨，各自引伸的進路，轉而成為蒐羅前人見解，持守深化的思考，切身體證，形構新安學人學術特色，甚至成為師門之間，共同追尋的目標，明儒援取為義理的基礎，乃是歷經辨證的發展結果，於此細節，筆者得見宋元之際新安學人的貢獻，也得以了解明儒發展四書學的背景脈絡，撮舉觀察，不敢自是，尚祈前輩學者惠予指正。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宋·王柏：《魯齋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 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88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元·胡炳文：《四書通》，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日本文化 9 年覆刊元至正 2 年壬午夏五日新書堂刊本。
- 元·倪士毅：《重訂四書輯釋》，收入王逢輯：《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明刊黑口本。
- 元·趙汭：《東山存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明·汪克寬：《環谷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汪舜民纂修：《（弘治）徽州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0-181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 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14-3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91-1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程瞳編：《新安學繫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
- 明·楊士奇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蔡有鵬輯，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 清·王梓材等撰：《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62。
-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 \*清·朱彝尊：《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
- \*清·施璜：《紫陽書院志》，合肥：黃山書社，2010。
- 清·紀昀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清·孫星衍：《孫淵如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7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 清·談遷：《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58。
- 清·顧炎武：《原抄本顧炎亭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 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二、近人論著

- 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33-59。
- 張巖：《《四書大全》研究》，武漢：中南民族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9。
- 陳逢源：《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 \*陳逢源：〈《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東吳中文學報》23（2012.5），頁219-246。
- 陳逢源：《「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

出版社，2013。

\* 陳逢源：〈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成大中文學報》49（2015.6），頁 75-112。

陳逢源：〈「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孔子研究》153（2016.1），頁 51-64。

陳逢源：〈納心於性——《四書大全》中雙峰一系的四書學〉，《孔孟學報》94（2016.9），頁 27-64。

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2009.6），頁 43-113。

\* 陳榮捷：《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解光宇：《朱子學與徽學》，長沙：岳麓書社，2010。

劉成群：〈「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經學為敘述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86（2013.3），頁 62-69。

劉成群：〈元代新安經學與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晉陽學刊》1（2013），頁 57-62。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1（2010.3），頁 1-36。

\*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閻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蘇惠慧：《元代新安理學研究》，合肥：安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6。

顧永新：〈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2（2006.3），頁 104-112。

〔日〕辻本雅史撰，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收入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31-135。

〔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

司，2014。

〔韓〕崔錫起：〈朝鮮時代經書解釋與崔象龍之《論語》解釋〉，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9，頁 99-150。

〔韓〕鄭亨愚：〈《오경 (五經) 사서대전 (四書大全)》 의 수입 및 그 간판 (刊板) 광시 (廣布) 〉(五經四書大全的輸入與其刊板廣布)，《東方學志》63(1989.9)，頁 1-2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Feng Yuan, “Analysis of the Pedigre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Da Quan)” in *Dong Wu Zhong Wen Xue Bao*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23 (May. 2012), pp. 219-246.
- Chen Feng Yuan, “From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Si Shu Ji Zhu) to Encyclopedia of the Four Books (Si Shu Da Quan) —A Survey of the Academic Pedigree of Zhu Xi’s Pupils” in *Cheng Da Zhong Wen Xue Bao*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o. 49 (Jun. 2015), pp. 75-112.
- Chen Rong Jie, *Zhu Zi Men Ren* [Zhu Xi Students] (Taipei: Student Books, 1982).
- [Qing] Huang Zong Xi, Quan Zu Wang ed., *Song Yuan Xue An* [Studies Case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aipei: Hua Shi Press, 1987).
- [Qing] Pi Xi Rui, *Jing Xue Li Shi*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 (Taipei: Hanjing Culture Press, 1983).
- Qian Mu, *Zhu Zi Xin Xue An* [The New Studies Case of Zhu Zi]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Qing] Shi Huang, *Zi Yang Shu Yuan Zhi* [The History of Zi Yang Academy] (Hefei: Huang Shan Press, 2010).
- [Ming] Song Lian et al., *Yuan Shi* [Yuan Dynasty History] (Beijing: Zhong Hua Books Company, 1976).
- [Song] 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Taipei: Chang An Press, 1991).
- [Qing] Zhu Yi Zun, *Jing Yi Kao* [The Criticism on Chinese Classic] (Taipei: Taiwan Zhong Hua Books Company, 1979).

